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

青 少 年 读 本

主 编：郭 莹

蒙学

选 读

李似珍 吴洁英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学选读/李似珍,吴洁英编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郭莹主编)

青少年读本

ISBN 7-5351-2618-9

I. 蒙… II. ①李… ②吴… III. 汉语-语言读物 - 古代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495 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厂

(430200·江夏区古驿道)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4 插页 6.5 印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6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2618-9/G·2131

定价:12.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传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虽然人们总是把它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来看待，但却无法割断与它的血肉联系。即使侨居国外多年者，如张爱玲，我们也仍然可以从他们的呼吸中嗅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氣息。

是的，这就是传统，一个民族无法割离的生命之根。无论它在现代社会遇到多么强劲的挑战，无论人们如何对它实行“现代性的转换”，它始终是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方式。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谓“中国的智慧”，其根底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面对这样的文化必然，我们怎能对传统漠然？无论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古老的智慧，还是要解决“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我们的现在是什么？我们最终如何生存”这样的终极性问题，我们都应该去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途径之一便是读一些经典性的中华典籍。在这些典籍中，你将会发现，其中的很多思想，不仅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而且仍然在影

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青少年读本)就是为如上文化目标而设计的,它的组编者是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该所在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史研究中,不仅高度注重学术创新与开拓,出版了《中华文化史》、《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知识分子命运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文化之道》等学术专著,而且还十分注意文化的传播与普及,组织编撰和出版了《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国古都》、《中国传统文化浅说》、《中国智慧集粹丛书》、《中国古典小说谈丛》、《中国社会生活谈丛》等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著作。《中华文化典籍精华选读系列》(青少年读本)正是后一系列的续作。本书系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精选中华文化典籍,各书选取代表性篇章,加以导读。所依版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准确性;选编内容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特点。我们热诚希望这套丛书能为青少年朋友以及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开启一扇通往中华文化瑰丽殿堂的门扉。

导 言

蒙学,也称启蒙之学,相当于现在对少年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本书所节录的是我国古代用以作为启蒙教育的读本。在这些读物中,寄托着我们的祖先对后代的殷切期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适宜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授自身的生存本领,告之以人生经验,使孩子们能少走弯路,较快地获得踏上社会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所以,阅读这些书籍,能使人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郁气息,更为深入地把握中国文化特点之所在。

(一)

我国的启蒙教育开展得很早,据青铜器上记载的金文,可知早在奴隶社会的周朝,官方学府中就有小学、辟雍、射庐等建制,其中辟雍为较高层次的教育场所,它以传授道德礼仪等为主要内容,射庐主要是习武的处所,而小学则为年幼贵族子弟读书学习的地方。当时主要是教这些孩子以数字、方位及书写文字和简单的计算,学习时没有专用的教材,由任教的长者视情况而定。春秋战国之后,教育逐渐走

入民间,在非官方开设的私学中,有相当部分属小学性质,它们被称之“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等。它们主要是教些识字与写字的课程,因此使文化得以传播与普及。汉朝初年教“写字”课时,已有《仓颉篇》这本教材。它是由闾里塾师把秦朝时所出的《仓颉》、《爰历》、《博学》三书合编而成,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余字,此书早已佚亡。以后又有同时代人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编过其他的一些书籍,在民间作“字书”的教材。这些书大都以三个字或七个字为一句,每句押韵,以几句为一章,分别列入姓氏、衣着、农艺、器具、自然、人事等应用文字,其中字多有重复,行文也较杂乱,只能供儿童在识字、习字过程中便利记诵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学读物内容日渐丰富,它们各自独立,涉及历史、地理、伦理等各个方面,还将文字分为常用字、难字、奇字等数种,分编成册,以便学生阅读。隋唐时的少儿教材开始采用“开蒙”、“蒙求”的题名,其义取自《易经·蒙卦》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句,意思是说“有不明白的东西,可就此而决疑”,以此开创“蒙学”这一说法之先例。

宋元以后,儿童自八岁入小学,则已有固定的蒙学读本。随着人们对启蒙教育的愈发重视,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宋代的朱熹、吕祖谦、王应麟,明代的吕坤、王守仁、方孝孺,清代的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陈宏谋,乃至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等人,都曾亲自编写过蒙学课本,这样使蒙学教材在质量与社会地位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它的体裁也因各学科领域学者的加盟而多样化。

中国的蒙学读物，经过数千年的创新与沿续，流传下来大量的论著，据有关资料提示，仅目前可以在各大图书馆找见的，就已达一千三百多种，可见其遗产之丰厚。

(二)

蒙学读物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它包括了经学或理学、伦理、历史、识字、名物和科技等多方面，如加粗略区分，可归之于这样三类：

(1)识字类。它以识字教育为主要目的，往往以采自民间的日常生活用字与词汇分类编排而成，使少年儿童能通过阅读或描红习字来认识与辨别清楚字形和字音。开始常以一些收入已规范化的文字本为教材，并不注意其中文字的连贯性。至汉代《仓颉篇》后，行文以四字为一句，内容也形成一定的段落。以后所出各种文本，除较注意在内容上有所教喻之外，尽可能不出现重复之字。其中以魏晋南北朝时的《千字文》最为典型，据说它做到了以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汇集成一篇语义连贯的文章，而且全文通顺富有文采，被称之为绝妙佳作。

(2)知识类。这是关于日常生活基本知识的蒙学读物，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天文、数学、医学、艺术等多方面。它能够传播一些生活常识，使少年儿童们自小就具备一定的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它们大多出现于唐宋时期之后，起初以综合论述的形式出现，后来有专论某一方面知识的著作问世。如唐代胡曾所作的《咏史诗》、北宋欧阳修所作的《州名急就章》、南宋方逢辰所作的《名物蒙求》、宋代丹元

子所作的《步天歌》、元代朱世杰所作的《算学启蒙》、元代祝明所作的《声律启蒙》，均以专科的方式传授了有关历史、地理、物候、天文、数学、韵律等方面的知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思想类。这是向蒙童灌输传统的伦理道德、处世之道和为人方式的思想修养类读物。由于中国曾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其间一直由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中国传统的蒙学读物中，也以儒家思想为其正宗。特别是宋明时期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思想，对中古之后成书的蒙学读物影响更为深刻。所以这一类读本中也可以细分为两种不同的格式。一种以传授有关儒学基本理论为宗旨，它包括总体介绍儒家经典及专门介绍某一经书或某一学派理论等多种形式。如《十一经问对》，是以问答体裁对历代所公认的儒家典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春秋》、《诗经》、《周礼》、《孝经》等书中的要义加以提示，为学童在完成蒙学阶段学业之后，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也有的是就一本著作或一家学说的基本思想所作的阐发，如元代陈栎所作的《论语训蒙口义》、宋代程端蒙等人所作的《性理家训》，即属此类性质，它们给儿童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自己就很注意将理学普及于启蒙教学的事业，他自己亲自编写过《训蒙绝句》一书，书中用七言诗句的方式写出有关理学思想介绍的诗歌计一百首，对理学中的“人心道心”、“仁”、“动心忍性”、“天”等特有的概念作出了精到的阐发，由此开始了理学弟子们撰作此类启蒙书籍的风气。这一类书籍曾在

社会上流行一时,但是随封建社会制度的日益走向没落,儒家正统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对人们精神的禁锢作用愈为严厉,人们自然而然地对经学、理学的启蒙读物产生了抵触情绪,所以它最终未能在社会上得以广泛的流传。

与之相反的是,思想类启蒙读物中另一类注重于宣传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中有关敬老爱友、和睦待人、好学向上等美好品质的书籍,则在世人中受到好评,并在历史上代代相传,行销极广。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始作于唐代的《太公家教》、始作于宋代的《增广贤文》、清代李毓秀作的《弟子规》、宋代王应麟作的《三字经》,等等。

蒙学读物由于其面对的是混沌初开的少年儿童,所以必须考虑如何才能被他们所接受的问题。针对中国汉字单音节及常用字形繁多、容易使人学得枯燥乏味、又不易记忆的特点,前人们创造了以韵语或对偶来排列文字的方式,强调形式整齐,以短句为主,词句形象而有连贯性,使之读起来琅琅上口、顺畅悦耳,内容上则形象鲜明突出,有助于通过联想、对比等方式增强记忆。这种形式对尚处于乐嬉游而怕拘束、多记忆而少悟性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是十分适宜的。为了达到语句通俗易懂的目的,我们的前人还大量采录了在民间流行的俗言谚语,并运用故事、图画等多种形式,来辅助孩童们的理解,可谓拳拳之心跃然于纸上,令人难以忘怀。

据此,本书的导读选择《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名物蒙求》、《历代蒙求》这六本书,作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多姿多彩的我国蒙学读物的代表作,以使

读者能因此而略窥中国启蒙读本之一斑。

(三)

六本书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书流传最为广泛，它们被统称为“三、百、千”。其中以《千字文》的撰写时间为最早，系南朝梁时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所编，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

据史书记载，周兴嗣（？—521），字思纂，是汉朝担任过太子老师的周堪的后代，世代居住在姑苏（今苏州市）。十三岁时到京城读书，博通经史，善于作文。梁武帝时在朝廷做官，武帝常要他写些碑文、铭文、皇帝实录之类的文章，并深受皇帝的赏识。后来梁武帝为便于宫廷的小太子们读书，令手下从书法名家王羲之的墨迹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每个字裁成一张纸；又召来周兴嗣，要求他加以编排成文。周兴嗣连夜不眠，编缀完毕后送给皇帝审阅，为此竟在一夜间生出了许多白发。皇帝十分满意，加以厚赐。以后周兴嗣得了眼疾，梁武帝还亲自为他请医生开药方。

《千字文》一书形式整齐，从头到尾都用四言写成，共二百五十句，计一千字，所以称之为《千字文》。全篇虽然只有有限的常用字，却不像前代的字书那样只是简单的堆积，而是组织成了通顺而有文采、并能表达一定意思的句子。各个句子之间，语义也前后连贯，颇有条理。全文包容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到了传统知识类型的各个方面，上谈天文岁时，后及上古历史，还有关于传统道德、名胜古迹、处世之道等方面的内容，描写得又无生硬造作之痕。所以它在问世

之后，不仅得到皇帝的首肯，也深得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的好评。历代书法家将其作为书写的好题材，以应人们寻觅传诵之需。早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篆书千字文》和《草书千字文》两种。王羲之的孙子智永禅师曾临写《千字文》八百本，散发于民间。宋朝徽宗以皇帝之尊，也写有《草书千字文》。清代孙枝秀，更以十年的努力，集成《百体千字文》，将周兴嗣《千字文》用百种书法家的字体加以书写，每二句书用一种字体，每种字体写八个字，这样写出全文。真可谓独具匠心。

《千字文》的精巧构思，引来历代许多人的竞相仿作，他们也希图通过组织驾驭一千个字以一展才华，以致使世间有多种《千字文》的续作、改作出现，它们在内容上各具特色，甚至于唐代的僧侣，也写了一部《梵语千字文》。也有些人在《千字文》基础上加以增广扩充，形成《二千字文》、《三千字文》……直至《九千字文》，等等。这种做法，已属文人学士的文字游戏，根本不适合于对儿童启蒙之用。

《千字文》除了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相当的影响之外，也被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字序，曾被用作一些街道屋舍的编号，一些图书如《道藏》、《知不足斋丛书》，也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分卷分类，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百百姓》相传为宋代的人所作。它的作者姓名至今已无从考证，人们往往以其书将赵姓放在第一位，来作为成书于宋的佐证。因宋朝是由赵匡胤所建立的，整个朝代由此只传给赵氏的后裔做皇帝。另外根据文中所收哈、爱等姓，

均为唐代始出现的对外藩的赐姓,可知成文又不至在唐代之前。

《百家姓》,所收姓氏不止一百家,全篇共四百七十二个字,现存版本共收五百七十二字。除篇末的“《百家姓》终”四个字外,另外的五百余字,由四百多个单姓和六十个复姓组成,故共录有近五百个姓氏。它纯粹是姓氏的堆积,不包含其他的意义,但是用韵语写成,读起来非常顺口。

《百家姓》成篇之后,很快流传开来,而且久盛不衰。南宋初年的诗人陆游,有《秋日郊居》诗,其中第三首为:“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句下自注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剑南诗稿》卷二五)可知当时《百家姓》已在民间广为风行。《百家姓》有文无义,可以说是有形式无内容,它之所以能流传得这么广,主要得之于它的实用性。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宗法制度之下,它以父系血缘关系为人们群居、结成团体的前提,所以人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姓氏走向与家族世系,而《百家姓》正可为人们了解和查验自己的姓氏提供一条线索。特别是以后又有人在《百家姓》正文后,注明该姓氏的郡望,这样更便于了解各个姓氏的来龙去脉,所以很适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

此外,《百家姓》上的文字基本上不重复,很适合于做识字课本,特别是它句短押韵,读起来上口,也适合儿童的特点;由于它没有什么含义,正好使擅长于死记硬背的儿童省却一道理解的程序;加之孩童在书中见到自己的姓氏,或自

已熟悉的亲戚、朋友、邻居的姓氏，都会随之而生出一种亲切感，这也使阅读增添了趣味，这些都是使得《百家姓》能在历代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

《三字经》大致作于宋代，它的作者是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以作者为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的说法最为可信。据史书记载，王应麟曾著有《蒙训》四十四卷、《小学训咏》四卷，还写过《姓氏急就篇》、《小学紺珠》等蒙学教材，是一位对蒙学读物有很深兴趣并在这方面下过很深功夫的人，由他来撰写《三字经》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但由于在同时代或稍后时代有关王应麟的著作目录中并不收入《三字经》，故引起后世的猜疑。

《三字经》篇幅不大，全篇仅一千二百字左右，但它内容丰富、知识密集，故有“袖里《通鉴纲目》”之称。它以劝学为全文宗旨，首起讲教与学的重要性，中间介绍学习的由浅入深顺序与内容，最后又介绍了历史上一系列勤学向上的人物故事，劝谕学童学习榜样，奋发上进。由于此书以三字为一句，句子较《百家姓》、《千字文》来得更为短小，又浅显明白，所以成为我国蒙学读物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文本，人们甚至于可将它作为我国蒙学读物的代称。

《三字经》成篇之后，注释、改编、翻译它的作品历代不绝。它的名义和形式也被广为应用，如清代时就有《地理三字经》、《历史三字经》、《时务三字经》、《女三字经》、《医学三字经》、《大学太极图三字经》等各种文本出现。可见人们对它的形式与编写格式的留恋。

如果说《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可视为识字类、

思想类蒙学读物的代表作的话，那么《千家诗》、《名物蒙求》、《历代蒙求》所能体现的则是知识类蒙学读物的特征。其中《千家诗》的编写是出于人们对诗歌教育的需要。中国历来是诗歌的王国，成书于上古时期的《诗经》在以后的数千年历史中，一直被视为重要的文化典籍而被列入正规教学中的必修课程，人们认为它在开发人的情感、丰富人的感悟能力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所以诗歌的教学也被逐渐地列入整个启蒙教学之中，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一个部分。最早进入启蒙教材范围的诗集是北宋人编著的《神童诗》，由于它收入的篇幅过小，内容与形式又过于单一，所以被后人所编的《千家诗》所代替。

《千家诗》共收录唐宋时人诗作二百二十七首，其中包括七言绝句九十五首，七言律诗四十八首，五言绝句三十九首，五言律诗四十五首。其中一百四十三首七言诗由宋末的谢枋得选定。八十四首五言诗由明代的王相选定。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唐宋诗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精神食粮之一，编者把选录的范围放在这里，可以说是把握住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

《千家诗》从内容上看，入选的诗作大都浅近易懂，通俗自然，篇幅最长不过是七言律诗，共八句，每句七字，全诗只有五十六个字，完全能为儿童所接受。作者在选录诗篇时，取材广泛，作者不拘身份，无论是帝王、士大夫，还是一般平民，甚至是僧人，一概以诗作为标准，一视同仁。

《历代蒙求》是历史类蒙学读物中的一种，这一类读本在蒙学读物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们在形式上有多种，

或以通史、或以断代史、或以古代史、或以当代史的方式构筑格式。另外，在所选择的体裁方面也十分多样，有的以诗歌为体裁、有的以韵语为体裁，也有的则以《千字文》式的识字本形式出现。其中有多本读物均以《历代蒙求》的名称出现。这些书中流传至今，较著名的为元代陈栎所著的《历代蒙求》与元王芮所著的同名书籍。后来由于陈栎的《历代蒙求》被明人朱升列入《小四书》，从而大行于世。陈著《历代蒙求》亦因此声名鹊起，成为咏史类启蒙读本的代表作。

陈栎(1242—1334)，字寿翁，休宁(今属安徽)人。宋亡后隐居著述，延祐时诏以科举取士，被迫试乡闾中选，但不赴礼部，在家乡教授学生。因所居住的堂屋称定宇堂之故，学者称他为定宇先生，晚号东臯老人。著有《尚书集传纂疏》、《历朝通略》、《勤有堂随录》、《定宇集》等多种。

《历代蒙求》四字一句，所述历史上起天地开辟，下迄宋末之初，篇末几句自金朝述至明朝，可能是朱升收进《小四书》时所加的。全书共二百三十六句，不到一千字。它在简短的篇幅中历述古今朝代、帝王世系及治乱之迹，能做到繁而不紊，简而有要。在古时颇为流行。

《名物蒙求》作者方逢辰，字君锡，南宋淳安(今属浙江)人。曾中状元，官至兵部侍郎、国史修撰，后因不满朝廷中奸臣专权误国，称病辞官回乡，以讲学为业。《名物蒙求》专门介绍各种名物的名称，范围包括天文地理、山川城邑、鸟兽花木、农事时令、饮食器具，等等，内容相当丰富。全书共六百八十句，篇幅较大，都比较切于实用，在同类著作中是最早也是最好的一种，所以明朝朱升也把它收录于《小四

书》中。

(四)

本书所选六部蒙学读物,由于它们都曾作为启蒙教育的课本而被广泛应用,所以在历代都经过多次刊行。本书所选《千字文》,据汪嘯尹纂辑、孙谦益参注之《千字文释义》,维扬集文堂刊本。《三字经》版本为清王相校订的《三字经训诂》,李光明庄刊本。《百家姓》为清王相笺注《百家姓考略》,维扬聚盛堂刊本,又据清康熙年间刻本而加以增补。《千家诗》选择清同治十年刻本,《名物蒙求》、《历代蒙求》则据宋方逢辰辑的《小四书》,清雍正十一年刊本。六本书中除《千家诗》因篇幅过大,采用节录方式外,其他各本均采用全文引入的方式,以便读者能对全书有完整的印象。《千家诗》中的选篇,考虑到本书所面向的是青少年,或许会在中小学课本中读到其中的某些篇章,所以尽可能挑选与课本内容不重复者,以便阅读者在诗歌欣赏方面扩展更多的知识面。

在中国历史刚刚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启蒙的课堂已让位于全新的小学教科书,它们在课程科目安排、文字的运用、主导文化思想的确定等方面,都已与传统蒙学的思路有着太大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学读物已不再有重新回顾的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风格与内容,正潜在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由于它的浅显易懂、便于记诵,所以也许它的普及性与影响力,更超过古籍中的正史与经籍。重读这些在历史上曾产

生过很大作用的蒙学读物，区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部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中的精髓。

事实上，蒙学读物中的许多内容仍为现代人所接受，如《千家诗》中孟浩然的《春晓》、杜甫的《漫兴》、《绝句》、李白的《静夜思》、王安石的《元旦》、刘禹锡的《玄都观桃花》、朱熹的《观书有感》、张继的《枫桥夜泊》、崔颢的《黄鹤楼》等诸多诗篇，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流传于民间，使我们在文学素养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感悟能力方面，都得到太多的教益。

人们对《百家姓》的兴趣可谓是久盛不衰，它能引起我们对民族血缘关系的联想，满足对历史寻“根”的需要，所以不仅在国内，而且对一些目前正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后裔也有相当的吸引力。为此，我国的中央电视台特据《百家姓》线索，拍摄了《百家姓》纪录片，除在电视台公开放映外，还制成录像带公开发行，在国内外均有很好的销售量。

至于《三字经》、《千字文》及《名物蒙求》、《历代蒙求》等书籍，也涉及到对志学、明理、待人友善、知史、惜物等处世优良品质的教诲，所以其中许多内容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过去常见一些读书不多的人，却懂得不少人情世故，具有应变能力，其诀窍往往是得益于蒙学的教育。蒙学书籍不仅在国内仍令人难以忘怀，而且还受到国外人士的关注，很多书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行于海外。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字经》一书，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丛书》予以推广，从而为全球人类文化作出贡献。